

希特勒

本书的出版使众多的希特勒传记都显得逊色过时了，
它是一部对第三帝国、希特勒研究的划时代著作。

——《泰晤士报》

报应

1936-1945

下卷

[英] 伊恩·克肖 著
赖 兴·王学政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希 特 勒

下 卷 | 报 应
1936—1945

作者 [英]伊恩·克肖

译者 赖 兴 王学政 房新文

陈 铁 周育江 张传兵

李少青 杨宇军 徐 昂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1998 by Ian Kershaw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Penguin Books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5, by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 全2册 / (英) 克肖 (Ian kershaw) 著; 廖丽玲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5
书名原文: Hitler
ISBN 978-7-5012-4922-0

I. ①希… II. ①克…②廖… III. ①希特勒, A. (1889~1945) —生平事迹 IV. ①K835. 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3062号

图字: 01-2000-4181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张 萱
赵 玥
陈可望

书 名

希特勒·下卷 (1936—1945) 报应
Xitele Xiajuan (1936 - 1945) Baoying

作 者
译 者

[英] 伊恩·克肖
廖丽玲 方 遒等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010-65135637 (编辑)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新华书店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 × 1000毫米 1/16 46¼印张
770千字
2015年7月第一版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922-0
168.00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的上卷试图向人们说明，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经济进步的现代化国家怎会允许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执掌政权，并将民族的命运托付给他，而且除了毋庸置疑的煽动和宣传天才外，此人几乎一无所长。 [XV]

通过兴登堡总统周围有影响力的人物玩弄诡计，希特勒最终攫取了德国总理的宝座。在此之前，他已经能在自由选举中获得德国选民将近三分之一的选票。左派那三分之一则坚决地站在其对立面，尽管它的内部是四分五裂的。其余的人通常是持怀疑态度，处在观望、犹豫之中。在上卷的结尾，我们追溯到了希特勒的权力变成近乎绝对权威的阶段。内部的对立已经遭到了粉碎。通过对内规模巨大的重建以及对外重新主张强权，希特勒恢复了失去的民族尊严，极大地消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耻辱感，大多数怀疑者因此被其征服。很多人将独裁视为福音，认为对持不同政见者、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或者公认的社会不和谐者的压迫，只是民族复兴的微小代价。希特勒此刻在人民中声望空前提高，对立派已被粉碎且无足轻重，军队的实力派、占有土地的贵族、企业家以及高层官员都争先支持他的政权。无论存在什么不利因素，各派力量都把纳粹政权看作是发展其自身利益所必需的。

上卷结尾谈到了1936年莱茵河畔再次军事化，希特勒此刻正享有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当选总理前没投票支持他的人中的大多数。从民族蜕变的深层分析，多数德国人对能够分享重新找回的民族自尊，感到非常心满意足。人们广为议论，德国正走上成为欧洲主宰的发展道路。在维也纳的日子里，希特勒曾有一种沉沦的强烈感受，现在这种感受早已为愈益积聚的政治使命感所替代。德国将从混乱中重生，并与挑战其国家生存的黑暗的危险势力抗争。到1936年，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对其近乎神化的吹捧，导致其自恋式的自我美化无限膨胀。此时，他认为自己是永远正确的，他的自我 [XVI]

认识达到了彻底狂妄自大的地步。

德国人民造就了这个人狂妄的个性。对此最完全的诠释就是，德国人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大的赌博，以期取得对欧洲大陆的完全支配地位。他们将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此次赌博本身就意味着走向自我毁灭的盲从，只有少数人看到，由于如此的狂妄自大，报应将随之而来。

在希腊神话中，复仇女神执行诸神对人类过度傲慢的愚蠢行为的惩罚。英国谚语“骄傲使人失败”说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历史不乏强人失败的例证，尽管报应更多地是指政治上的，而不是道德判断方面的。统治者、政客或位高权重的宫廷宠臣流星般飞黄腾达之后，常因权力而生傲慢，以致同样迅速地失去天恩。通常，傲慢导致明星人物最终的痛苦。他闪亮登场又迅即消失，苍天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历史上，个人的狂妄自大通常代表了社会中更强大的势力并将导致更深远的报应。拿破仑出生卑贱，却在革命的动荡中攫取了法国政权，黄袍加身，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大陆，但最终失败和流放告终。帝国被取代、被肢解、遭侮辱，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但拿破仑并未毁灭法国，他的重要影响完好地保存下来。国家行政体系、教育制度和法律条文构成了他的三项重要遗产。不仅如此，拿破仑没有被绑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他能够使现代法国人感到自豪。

[XVii] 希特勒留给人类社会的遗产却完全相反，是彻底毁灭性的。他在现代社会是独特的，也许只有历史上的匈奴人和成吉思汗与其略微相似。无论是建筑遗迹、艺术创作、政治体制还是经济模式，希特勒的帝国都没有任何可留给后世的，更别说道德水准了。机动车、航空等技术从总体上讲确实进步了，部分是因为战争而强迫实现的，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如果德国没有希特勒，肯定也能取得同样的进步。与拿破仑最为不同的是，希特勒留下了严重的道德创伤，以至于他死后数十年，仍然不可能用赞同或是羡慕来看待这个德国独裁者和他的政权。除了憎恶和谴责，甚至不可能带有任何其他感情。

即使是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或者佛朗哥，人们对其在道德方面谴责的程度都不可能如此一致。当希特勒意识到战争失败已不可避免时，他仍然认为他在历史上的位置应处于德国伟人祠的最高处。然而，事实上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可憎恶的人。他在历史上的确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而是作为现代政治罪恶的化身。罪恶是神学或是哲学的概念，而不是历史学上的术语。称希特勒为罪恶，既完全符合事实，从道德的

评判角度又能令人满意。但这不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一致的谴责甚至潜在地严重妨碍了人们理解和解释这一切。我希望，在以下的章节里我清楚地表明，无论希特勒的政权代表了什么，我发现他本人是一个可憎的人。但我对他的憎恶丝毫不能帮助我理解，为什么成千上万普通的德国人会认为希特勒鼓吹的东西如此具有吸引力？难道他们已做好准备，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盟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直至痛苦的结局？他们跟其他任何地方的普通人一样，基本都关注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福利和日常生活，决不会被宣传完全洗脑或迷惑，也不会被残酷的压迫屈服。因此，正如上卷那样，我在本卷不打算就历史人物的善恶进行道德上的专题讨论。我只想探讨，希特勒是怎样控制社会的，而社会最终为支持他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因为，希特勒前所未有的傲慢最终得到了报应，这并不仅仅是对个人的报应，而是对产生他的国家的报应。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德国被夷为废墟，遭到分裂。原来的中部德国，“中部德意志”，因此经历了苏联战胜者强加的价值观念长达40年的统治，而其西部最终在“美国女神”的影响下得以复兴和繁荣。一个新的奥地利，重新独立后失去了成为德国一部分的野心。帝国的东部省份可能将永远失去，同时失去的还有向东扩张的梦想。德国少数民族从东部地区被驱逐，如果所付出的代价还可以预测的话，将消除困扰战争年代的领土收复主义。这些省份里曾经是容克贵族统治基础的大面积地产也将被清除。曾经作为德国军事力量的最终象征的德国国防军，也将丧失声誉并被解散。随之而去的还有普鲁士政府，它从俾斯麦时代就是帝国经济和政治力量的骨干。当然，大型工业将很大程度上保存完好，尽管它们现在已日益融入了西欧和美国的经济框架。 [XViii]

所有这些都是本书下卷希望找到的答案。希特勒是怎样取得并行使其绝对权力的；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会听命于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竟然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群众的欢呼，这在一个现代国家实属特例，人们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不能自拔，而此人正带领大家沿着毁灭的道路准确无误地走去；这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是如何变成种族灭绝的同谋者的，结果导致前所未有的、国家发动的大规模屠杀，整个大陆遭到破坏，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最终毁灭。

这是关于国家和个人自我毁灭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以及它的代表自我设计灾难的故事，而欧洲文明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尽管我们知道了结果，但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仍值得我们再次思考。如果本书能帮助读者加

深理解，我也就非常满足了。

伊恩·克肖

2000年4月，曼彻斯特/谢菲尔德

致 谢

在结束本书上卷时，我已向当时帮助过我的人表达了深深的谢意。而在 [XVI] 编写此卷的过程中，又有许多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对于两年前曾给予我帮助的机构、学者和个人，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至今未变，或者说变得更加强烈了。希望当时提到过的人此刻能再一次地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尽管我未将他们的名字再次一一列举。一方面，我必须明确地重申我对某些人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我还欠下了很多新的人情债。

十分感谢以下机构的主管人员、档案员及工作人员帮助我搜集与此卷密切相关的档案材料，这些机构是：巴伐利亚档案馆、柏林档案中心、历史图书馆（斯图加特）、伯明翰大学图书馆、伯茨维克学院（约克郡）、柏林联邦档案馆、波茨坦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皮兹堡杜克森大学冈姆伯格图书馆、前东柏林中央党史档案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会（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伦敦公共资料室、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莫斯科“特别档案”馆、伦敦韦恩纳尔图书馆及前波茨坦中央档案馆（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尤其要感谢劳夫地方法院的法官弗劳·雷格瑙尔，感谢他向我提供了1945年战争的关键目击者的证词——尽管这并不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

首先，与写本书上卷时一样，著名的慕尼黑历史学院所提供的非常专业的帮助使我获益匪浅，我能完成此卷，他们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想再一次向该学院的院长、教授霍尔斯特·穆勒尔博士以及该学院的所有同事 [XX] 和朋友表达我最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处理我频繁提出的大量要求时，他们的表现实在是一个奇迹。单独地感谢某个人是不公平的，然而我必须提到赫尔曼·韦伯，从我写上卷时开始，他就极其慷慨地贡献出他的时间和档案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艾尔克·弗罗里克，

她在戈培尔日记方面无与伦比的渊博知识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由于戈培尔的笔迹很难辨认，所以当我对某个地方产生疑问时（这个疑问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却很难解答），她的帮助就显得尤其重要。

许多朋友和同事除了与我分享他们对证词、学术文献的看法及对某些关键问题的理解以外，还在不同的时候给我提供宝贵的档案材料或是让我一睹他们尚未发表的著作。我非常感谢以下各位在这方面给我的帮助和支持：大卫·巴恩科尔，奥姆尔·巴托夫，耶杜达·鲍乌尔，理查德·伊文斯，肯特·费德洛维奇，埃里·弗茨契尔，科南·费舍尔，杰拉尔德·弗莱明，诺尔伯特·弗雷，玛丽·富布洛克，迪克·杰阿里，赫尔曼·格拉姆厄，奥托·格里茨纳德尔，洛萨尔·格鲁奇曼，乌尔里奇·赫伯特，爱德尔德·里布格尔里奇，达恩·米奇曼，斯迪格·豪恩肖-穆勒，马丁·穆尔，鲍勃·摩尔，斯坦尼斯劳·纳弗洛基，理查德·欧弗里，阿拉斯塔尔·派克，卡洛尔·马里安·波茨拉克斯基，弗里茨·雷德里奇，史蒂文斯格，史蒂芬斯特尔，卡尔·斯奇勒尼，罗伯特·塞尔维斯，皮特·斯塔奇乌拉，保罗·斯塔乌夫尔，吉尔·史蒂芬森，伯恩德·威格纳尔，大卫·威尔奇，迈克·韦德特，皮特·韦特，汉斯·沃勒尔和乔纳森·怀特。

我必须特别地感谢梅尔·米凯里斯，因为他曾多次慷慨地将自己研究中的档案材料提供给我。同样地，吉塔·塞勒尼不仅给了我朋友般的支持，还让我使用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与她阿伯特·斯佩尔的杰出研究相关的文件。我的好朋友劳伦斯·李斯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制作人，他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我曾有幸与之合作拍摄过两部有关纳粹的电视系列片。德特勒夫·斯尔伯特和蒂尔曼·勒梅这两位节目研究小组的领军人物很有才干而且知识渊博，他们就我的文章提出了一针见血的问题，他们协作拍摄的影片还给我提供了研究的材料，这些对我都有极大的帮助。两位研究第三帝国历史的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对希特勒的认识有很大分歧，但是对于我的研究而言，他们俩却同样重要。艾伯尔哈德·杰科尔一直不断地给我提出很多很内行的建议，还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而我多年的老朋友汉斯·莫姆森则从未吝惜过他的帮助、慷慨和鼓励。他们都曾将尚未发表的著作供我使用。最后，我要向特德·哈里森和杰瑞米·诺阿克这两位研究纳粹德国的英国专家表达我最深的谢意，他们在我完稿以后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当然，任何未被发现的错误都是我自己的责任）。上卷结束时，我就非常想感谢杰瑞米，因为她的著作给了我特别的启发，而此时此刻我仍然很想再一次地强调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XXi]

另一方面，我要向约克郡的伯茨维克学院的院长大卫·史密斯先生表示感谢（在这个学院里，约克郡中世纪的档案材料和有关哈里法克斯阁下与希特勒的会见的重要文件放在了一起，这恰好满足了我在学术方面的“精神分裂症”的需要：作为一位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我对中世纪约克郡的修道院制度也非常感兴趣）。正是因为大卫慷慨地献出他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我们才得以顺利地编辑和出版了那本描绘13、14世纪伯尔顿小修道院的书，为完成本卷而进行的工作也没有受到干扰。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和投入，这一切都将是不可可能的。

由于我必须在撰写本书的同时履行我在谢菲尔德大学的日常职责，我不得不对企鹅出版社和国外编辑们的耐心提出很高的要求。能遇到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这样的编辑令我感到非常的幸运，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敏锐的读者和批评家，还因为他自始至终都用令人振奋的话语激励着我，用他乐观的精神鼓舞着我。西蒙还就本书的照片材料和地图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而塞西利亚·麦卡伊经过多方寻找才将这些照片收集齐备。为此我深深地感激他们两位。关于这一点，我还要感谢英国广播公司的乔安妮·金、给了我极大帮助的斯图加特历史学院的院长杰哈德·希尔斯菲尔德博士（这位杰出的学者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以及在收集大量照片的过程中担任监督工作的埃莲娜·雷兹。在准备长长的付印稿件的过程中，安妮·李专业的编辑和戴安娜·勒科里编写索引的完美技巧让我受益匪浅，而企鹅出版社的整个出版队伍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因此要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

在英国以外，我深深感激美国诺顿出版社的编辑道·拉姆先生。他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洞察力和无穷无尽的疑问一直让我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惕”，生怕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任何的纰漏。当德意志出版社的乌尔里奇·沃尔茨、迈克·纳赫尔和我在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光谱出版社及半岛出版社的编辑们未能按时收到那篇很长的尚未翻译的文稿时，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要不然就是没有让我觉察到他们的惊惶，无论如何，我很感激他们的耐性和自制力。正是由于翻译们奇迹般的工作，本书的德文版、法文版、荷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才得以同时面世。对于他们付出的努力，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他们高超的翻译技巧，我也是极度的钦佩。

与撰写上卷时一样，大部分的注释核对工作是在慕尼黑的历史学院进行的，大量的注释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核实完毕。这一次，由于企鹅出版社和德意志出版社的安排，我得到了温克·梅特灵、我的侄女和长子的帮助。温

[XXii]

克·梅特灵利用自己工作的间隙前来帮助我（她在杜宾根大学进行的历史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的侄女夏洛特·伍德福德从她的博士学位研究中（她在牛津大学研究德国早期现代文学）抽出时间来协助我核对注释（她后来找到了许多我需要的鲜为人知的书籍，而且还非常细心地、一丝不苟地汇编了一个参考书目，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的在航空部门工作的长子就像两年前那样非常慷慨地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赶到慕尼黑来帮我核对参考书目——这多多少少令他的同事们感到有些惊讶。为此我深深地感激他们三位。如果没有他们，我将很有可能无法按时完成任务。

我想对无与伦比的亚历山大·冯·亨伯尔德-斯蒂福敦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因为进行注释核对工作而两度住在慕尼黑，这期间的一切费用都是由该组织支付的。自从我于七十年代中期成为亚历山大·冯·亨伯尔德-斯蒂福敦的成员以来，我有幸得到了许多慷慨的帮助，并且从中获益颇多。

我还要向我多年的老友特劳德·斯帕特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多年以前，她作为一名语言教师的高超技能令我对她的祖国历史中这一最黑暗的时期发生了极大兴趣，也促使我后来从事了这方面的研究。我在慕尼黑的时候曾有幸住在她的家里，她不仅亲切热情地招待了我，还在工作上给了我很多鼓励。

在蓬勃发展的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里，我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同事们出色的工作和宽容的态度，还要依靠我的学生们的耐心——这种依靠往往超过了我本人的意愿。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他们的支持、鼓励和耐性。我还要特别地感谢一些同事，他们承担了系里那些有时候相当艰巨的工作并且高效率地完成了任务，从而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

[XXiii] 我最想感谢的是比弗利·伊顿，在担任我的秘书和私人助理的10年中，她给了我有效的帮助和很大的鼓舞。我在面临很多其他紧迫工作的情况下还能完成本书，她的帮助和鼓励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由于我试图在担任大学教授（当时英国的教育已被自身的官僚机构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同时编写希特勒的传记，所以有很多事情我根本无暇兼顾——系里繁忙的日常管理工作、大量信件的整理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事情。在撰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都在背后支持着我。

最后，我还要感谢英国曼彻斯特索夫皮克俱乐部的老板及其会员们，他们所给予我的友谊和支持不仅仅限于撰写希特勒传记的这段时间。为了我和妹妹安获得在大学学习的宝贵机会，我母亲和已去世的父亲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尽管事情已过去多年，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两位经历过希特勒的战争

1936年：希特勒的胜利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希特勒这一新的举动是通往地狱破坏之门的又一个里程碑。”

[XXXV]

——《德国报道》，1936年4月

“三年过去了，我认为德国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可以说已于今天结束了。”——那天是1936年3月7日，德国军队公然蔑视西方各民主国家，开进了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而希特勒在德国议会演讲时说了这番话。“三年来，我在上帝的指引下为我们的祖国赢得了伟大的成就”，希特勒继续他的演讲，“在民族、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地位都得到了提高……这三年中，德意志找回了荣耀，重拾了信仰，克服了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其文化也终于开始了新的复兴”。在为自己的“成就”大唱赞歌的同时，希特勒还明确表示“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演讲结束时，他呼吁 [XXXVI] 人们在3月29日的新一轮“大选”中支持他（尽管只有纳粹党一个党参加选举）——他的这一请求赢得了热烈的欢呼。这次选举的结果是：98.9%的选民支持希特勒。无论这一数字含有多少“水分”，无论政治宣传与高压统治在选举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在1936年3月，绝大多数的德国民众都赞成希特勒恢复德国对莱茵地区的主权（正如他们支持希特勒为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而于早些时候采取的其他措施一样）。对希特勒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对外的巨大成功，也是一次对内的重大胜利。

希特勒的胜利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英法这两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推翻了维持战后和平的两大支柱，却未受到任何惩罚。希特勒的行为还显示了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固执专断和新的重要地位。

此时的希特勒在德国国内享有绝对的权力。这个欧洲中部最大、最发达也最具威胁的国家拜倒在他的脚下，注定要经历一场“神圣”的“民族救亡”的政治斗争。希特勒独裁者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也没有遇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的威胁。

事实上，轰动一时的莱茵进军在整个国家所激起的兴奋情绪本身是不会长久的。民众很快又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担忧和抱怨。工人对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不满、农民对食品区“强制经济”的憎恨、小商贩对恶劣的经济状况的抱怨以及普遍存在的消费者对价格的不满依然强烈。纳粹党官员的行为和腐败仍然引起人民的抱怨。在天主教地区，“教会斗争”更加激烈，纳

粹党对教会活动和教会建筑的破坏、对教会教育的攻击和对神职人员的骚扰（包括大肆宣传对涉嫌走私外汇和不正当行为的神职人员的审判）使人们的情绪变得极端不安。然而，最好还是不要过高地估计这些不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都没能转变成任何有可能给政权造成真正麻烦的政治反对力量。

左翼的反对力量，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因受到镇压和威吓而变得软弱无力——在希特勒不断采取行动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各个民主国家所表示出的软弱的默许态度使他们感到沮丧。由于西方大国的软弱，舆论宣传中那个拥有非凡胆量和政治天赋的政治家形象在无数人看来好像成了不争的事实。尽管面临着遭到残酷镇压的威胁，危险的非法秘密抵抗活动始终没有中断，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这一短暂的时期内甚至得以复兴（当时食物的缺乏在工业地区引发了严重的动荡局面），此后也从未停止过。但是，一场短命的共产主义复兴运动爆发了，为消灭与之相关的一切可疑迹象，盖世太保发动了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过后，任何非法组织发动的自下而上的反抗都遭到了有效的镇压。抵抗派组织，特别是共产党的藏身之处总是盖世太保告密者寻觅的对象，因而这些地方经常遭到袭击，反对派成员也经常遭到逮捕，然后被囚禁在监狱或者集中营里。据估计，在1932年的30万名共产党员里，两个中就有一个曾在第三帝国的某个时期遭到过囚禁。这一数据表明，残酷的镇压正在不断地消耗抵抗派的力量。尽管如此，新的反对派据点仍不断涌现。这些人冒着牺牲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在斗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但是，他们一点权力或影响力都没有，与高层又缺乏联系，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推翻政权的机会。所以他们当时根本无法对希特勒构成真正的威胁。事实上，危及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反对力量现在只可能来自其政权内部，除非一个单枪匹马的非纳粹党人采取无法预见的行动——1939年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

与此同时，政权的支柱——军队、纳粹党、工业界和文职机构——都对希特勒忠心耿耿。

保守党的精英人物们1933年帮助希特勒掌权时，幻想着能控制和操纵他，然而他们现在却不敢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在这些派系中，不安的情绪非常明显，尤其是在1934年春夏之际国内危机蓄势待发的时候。这场危机因为纳粹党冲锋队的领导阶层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被集体屠杀（也因为其他真正的或是假定的反对派遭到清洗）而结束。但是，不管保守党精英阶层对纳粹党内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党内领导的暴行和对基督教教会的攻击抱有多大的疑虑，也不管他们对不受法律约束的纳粹党和政权的其他令人

不安的方面有多么担忧，但到1936年初，他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远离希特勒。

与大多数人相比，军人不满意的事要少得多，尽管他们经常瞧不起那些现在管理着国家的“粗俗的暴发户们”。在希特勒政权早期，军队与冲锋队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帝国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和少将费尔南德·冯·布勒多在“长刀之夜”所遭到的政治谋杀似乎只是为消灭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及其同伙所带来的灾难而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那些黑暗的日子，纳粹德国的军事领袖们都从未放弃过重建一支强有力的国防军的目标，而此时他们发现，这一目标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当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禁令，于1935年3月重新开始实行大规模征兵（并以其为基础将其和平时期的军队大大地扩展到36个师）的时候，军方感到非常高兴。希特勒曾于1933年2月许下诺言：“在未来的四到五年中，我们的主要原则必须是：一切为了军队。”为配合这一承诺，他进一步加快了军队重建的速度。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组建德国空军——这是对《凡尔赛和约》进一步的蔑视——而未受到任何惩罚。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6月，英国心甘情愿地与德国达成一项海军协定，允许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海军的35%的海上力量。这样，英国就自愿地成为了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帮凶。随着莱茵地区的重新武装，希特勒完成了军方领导层多年来的心愿，尽管他们当时根本不敢对这一行动的可能性抱有任何奢望。军队领袖们希望希特勒做的事，他都做了——甚至更多。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对那些商业巨头来说，他们很感谢希特勒摧毁了左翼政党及工会组织，尽管他们个人常常对当前的经济困难和将来会出现的经济问题心怀忧虑。在跟工人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又成了“一家之主”。他们还可以轻松自由地大幅度提高利润和红利。虽然有人对政党的干预表示批评，虽然有人指出出口贸易萎缩和原材料缺乏的问题，虽然有人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表示担忧，但没有一个企业家——即使是在私下——鼓吹回到魏玛共和国那“糟糕的”民主时期。

一些来自保守党精英集团内部的人——主要是军队的领导阶层和国家官僚机构的上层人物——将会在大约两年后逐步地并且犹豫地摸索着走上与纳粹政权根本对立的道路。然而，当时希特勒的形象所代表的民族专断和重建国家的政策很明显是成功的，而且他们也还认为这些政策是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的，同时也是有利于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

全国上下在其他方面可以说已达成一个广泛的压倒一切的共识（当然有一部分是镇压和舆论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只有激烈的“教会斗争”给这一共识蒙上了深刻的阴影，因为它在神职人员、经常去做礼拜的群众与纳粹激进分子两方之间引发了激烈的摩擦。在教会势力仍很强大的农村地区，这一阴影尤其显著。但是基督教的两个主要派系都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神职人员们不得不谨慎行事，听取民众的意见，尽管他们在经常去做礼拜的群众当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领导民意，而更多地接受民意的指引。他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教民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对纳粹攻击教会抱着严厉的批判态度，但是即使在这些人中间，希特勒为德国赢得的那些“胜利”（尤其是成功地重新武装莱茵地区）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教会斗争”所激起的动荡不安是广泛的，但是这种不安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割了。它未能促使人们从根本上否定希特勒政权，或是促使他们主动地投身于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中去。他们可以顽强地捍卫传统的惯例、风俗和习惯，使之不被纳粹的阴谋诡计所破坏，同时也可以对希特勒本人表示支持，可以对希特勒打击左派的政策表示赞同，可以对他所取得的国家“胜利”拍手叫好，还可以准备接受他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事实上，他们可以接受大多数对宗教事务没有直接冲击的政策——这一切都是不矛盾的。天主教派的主教们在希特勒当上总理的最初几个星期内就抛弃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指责，转而向其表示服从。即便是在“教会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还公开地表示了对“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并重申了对希特勒的忠诚。集中营的惨无人道、1934年对冲锋队领导人的谋杀和日益严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都没有引发正式的抗议或反对。新教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内部分化成了两派（除了少数几个特例以外）：一派因为纳粹对教会的专横态度及其对教会事务、教会活动、教会结构和教义的干涉而表示不安、批评或不满；另一派则正式申明效忠希特勒，并对他所采取的行动表示由衷的赞同。

1936年春天，群众的崇拜使得希特勒不容置疑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很大一部分的民众简直将他当成了偶像。就连他的对手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时从事秘密反对活动的社会党人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希特勒确实是一个人物，他有冒险的勇气。”为什么这个独裁者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拥护呢？为什么就连那些一直都不怎么喜欢他的人也支持他呢？原因就是：“每一个德国人都痛恨《凡尔赛和约》的精神，而希特勒撕毁了这个可恶的条约，并把它扔在了法国人的脚下。”希特勒为德国人民找回了民族自豪感（没完没